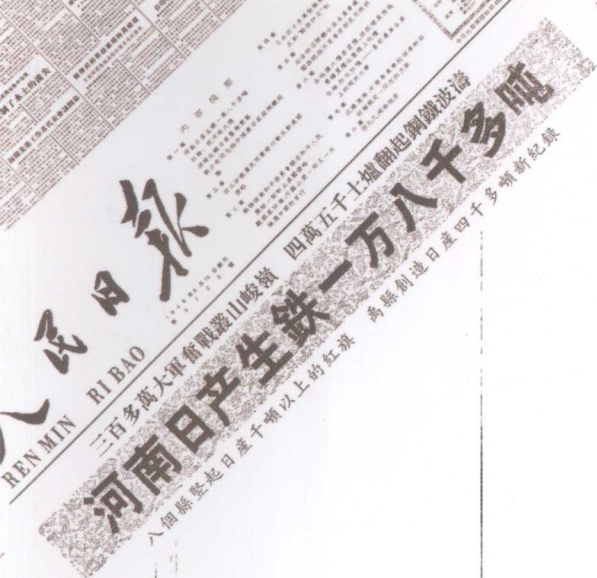




袁晞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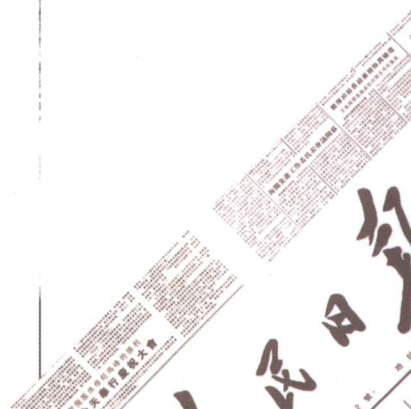
Editorial
and History

社论串起来的
从范荣康先生的讲述中回首往事

历史



人民出版社



社论串起来的

从范荣康先生的讲述中回首往事

Editorial
and History

袁晞 / 著

历史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丽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论串起来的历史——从范荣康先生的讲述中回首往事/袁晞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

ISBN 978-7-01-007861-8

I. 社… II. 袁… III. 中国-现代史-史料 IV. K2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2756 号

社论串起来的历史

SHELUN CHUANQILAI DE LISHI

——从范荣康先生的讲述中回首往事

袁晞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1.75

字数:350 千字

ISBN 978-7-01-007861-8 定价:4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写在前面

2000年同事李辉和我与我们的老领导、已离休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范荣康先生商定，由大病初愈的范荣康先生口述、我们整理，共同完成一本以《人民日报》社论为线索的往事回忆，记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国历史的一个侧面。

由于范荣康先生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就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改革开放以后，他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的秘书，后担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离休前是《人民日报》分管评论、理论、文艺等方面的副总编辑，相当于旧时中国和今日港台报纸的“主编”兼“主笔”，起码是其中之一。在担任评论部主任和副总编辑期间，他亲

笔撰写和主持起草了《人民日报》许多重要社论。他了解当代中国许多重要事件的幕前幕后，应该说既是历史的参与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和记述者。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看看三十年前的报纸，1978年“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元旦社论的题目是《光明的中国》，1979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的题目是《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上来》，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了一个光明的中国，《人民日报》的前辈们是尽了一分力的。中共党史专家龚育之先生曾写道：“文化大革命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全党酝酿和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人民日报》积极地、勇敢地推动和引领了拨乱反正、全面改革的潮流，走在伟大历史转折的最前头。这恐怕是《人民日报》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龚育之先生的说法是很有见地的。我认为，范荣康先生是这一时期《人民日报》优秀团队的骨干，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有特殊贡献的。

2001年4月，范荣康先生不幸因病去世，我们的工作只进行了一部分，写完了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到六十年代中期的两部分，“文化大革命”时期只开了一个头儿，改革开放时期还没有写，令人遗憾。

2002年《百年潮》杂志副社长姚鸿先生得知此事，希望我将未完成的书稿发表，我整理出大部分已完成的内容，在当年第七期和第八期《百年潮》杂志刊载，同时把范荣康先生去世后我写的一篇文章略加修改，以《我认识的老范和未完成的书稿》为题同时发表，简要介绍范荣康先生的经历和写这些文字的前因后果，这些内容引起很多读者的兴趣，至今仍有人要当时的杂志看并说起有关的往事。

从那时至今，五六年又过去了，再看这些未完成的书稿，仍然觉得有必要将过去的历史告诉今天的读者，中国今天的发展是历史的继续，鉴往可以昭来。

在写这本书时，我仍按与范荣康先生生前商定的时间段划分章节，以当年范荣康先生撰写的一篇或几篇类似的《人民日报》社论为一章，每章分三节，第一节为经范荣康阅改的口述记录，即当年写社论时的原

因和社论发表后的反应，这是一个当事人的记忆和后来的认识；第二节为当年《人民日报》社论的原文，如果不看这些社论的全文，不足以完整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第三节“回望历史”是我——一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生、在范荣康写社论的时代长大的普通中国人——对那一时期的历史感受和今天的历史认识，以期同我敬佩的范荣康先生一同回到历史中，再从历史中感受今天和思考未来。

《我认识的老范和未完成的书稿》仍按2002年发表时的原文收入这本书，作为全书的引言，让今天的读者对那段往事和范荣康先生有初步的了解。

时间过得真快，范荣康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七年了，我和我的很多同事还时常说起他，怀念着他。感谢范荣康先生为我、也为这本书的读者讲述了历史。

2008 年春

我认识的老范和未完成的书稿

人民日报社大院里认识范荣康的人好像都叫他“老范”。

我一到《人民日报》工作，就在老范手下，当然他是副部级的副总编辑，我是最低一级的编辑，中间还隔着主任、副主任、组长、副组长好多级，由于我所在的文艺部归老范管，编好的版要老范阅后签字才能付印，跟老范打交道是经常的事儿。他看报纸大样的速度极快，在大样上修改的不多，但多是政策的关键之处，所改的文字也往往是画龙点睛之笔。我接触的老范是个好领导，似乎具备办报的所有才能，但他不强加于人、不推卸责任、不卖弄才学，总是在最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与老范有不同意见也可以争一争，他也常常接受他认为正确的意见。记得有一次老范修改了我拟的标题，我认为改得不如原来好，去找他说理由，他当时没接受我的看法，我回到办公室，老范打来电话说：“我又想了想，你说得有道理，就用原来的吧。”

老范与我们这些普通编辑平等相处，一同去看演出，一起聊天，抽烟的人找老范要好烟抽。我跟老范挤坐在观众席上一起看过流行歌曲演唱会，听过京剧、川剧，还在回家的班车上闲聊，从报纸、文艺到时局。



范荣康先生（李辉摄）

老范是那种什么事儿都关心，什么事儿都知道的聪明人，他的夫人湛容和子女都是中国文学艺术界的名人，全家可能是“掌门人”老范在社会上最不出名，不过在新闻界的很多朋友眼里，老范是沃尔特·李普曼、詹姆斯·雷斯顿似的人物，虽然中国和美国不好比，虽然当代中国新闻行业不太能表达个人的观点、展示个人的才华。

在《人民日报》工作的近四十年中，老范起草了许多重要社论，写了很多重要文章，《人民日报》社论曾经是可以呼风唤雨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老范是工业组的编辑，写过多篇社论；“文化大革命”中是评论组的编辑，参与起草撰写了不少“两报一刊”社论。改革开放以后，老范担负了更重要的工作，他先后担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和主管理论、评论、文艺等部的副总编辑，撰写重要社论，组织重大报道，了解许多重要事件的决策过程。

在过去的一些年，《人民日报》的领导不是容易做的官儿，我曾向老范说过别人的玩笑话：《人民日报》是中国政治波涛中的一条船，社级领导坐在船顶上，风浪一大就要掉下去；部主任坐在甲板上，风浪大时要自己抓住；只有坐在底舱的普通编辑一般不会掉下水。《人民日报》社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

老范听后一笑置之。

离开《人民日报》的工作岗位后，老范说过，这下儿可以不写命题作文了，可以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了。不幸的是，几年中他连得几场大病，不再能从事心爱的文字工作。

2000年年初，李辉和我先后去看老范，谌容老师说老范恢复得还可以，头脑也很清楚，李辉问老范能不能谈谈他知道的事情，由我们记录整理成书，老范说他也正想找人帮助写回忆录，他和谌容老师欣然接受了李辉的建议。

谌容老师告诉我们，老范患有六七种严重的疾病，能活下来已很不容易，虽然老范着急要写东西，但我们还要听从医生的意见，慢慢做着。

老范说，他在《人民日报》近四十年，干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写社论和评论员文章，他和我们商定，回忆就从他参与写作的社论和其他重要文章说起。

我们设想，这本书是写给那些经历过老范写社论的那些年代的人看的，因为《人民日报》社论从某种程度影响着中国社会，甚至改变了许多个人的一生；这本书也是为更多的想了解中国那个时代、认识中国历史的人写的，是为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历史留下一个方面的真实文本。

李辉那段时间忙，我先开始了和老范的工作。

我觉得老范身体不好，劝他想到哪儿就说哪儿，或者先拣有意思的事儿说，但老范是个严谨的人，他认为应按时间顺序讲，他说中国是从五十年代走到了文化大革命，又是因为有对十年浩劫的拨乱反正才有了改革开放，中国的几十年有其必然的联系和发展。他还说这本书是不是可以按时间段写四个部分，并告诉我他分的时间段和为每个部分想的标题，四部分分别是“探索”（1952年—1957年）、“遵命”（1957年—1966年）、“灾难”（1966年—1977年）和“改革”（1978年—1989年）。我在自己的电脑上建立了“范荣康”的文件夹和这四个部分的目录。

按医生说的，老范不能劳累，每次谈话别超过一小时、隔几天一次

的条件，在2000年春节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每周一次，每次一小时听老范讲述他与《人民日报》的往事，然后整理成文，打印出来给老范看和修改，疾病使老范说话有些困难，但他的记忆相当清晰，他能清楚地告诉我许多重要文章的标题和刊发日期，我找到这些文章复印给他看，他又能清楚地说出文章的重要性和写作过程。这期间谈话由于老范多次住院而间隔。肺部的疾病使老范呼吸不畅，每次谈话也不时停顿。谈话和记录进行得很慢，到2001年3月才谈到1966年的事。2001年3月22日，我到老范家，他的病加重了，呼吸更加困难，老范似乎预感到自己的时间紧迫，说话特别着急，而越着急越喘不上气来，整理录音时，一小时的录音带我只写下了十几句完整的话，其余全是老范的喘息声。那天告别时，老范说：“再见”，并嘱我下个星期再来。

下一星期我如约前往老范家，按门铃没人应答，打电话也没人接，以往老范有病有事不能谈时，谌容老师都要提前通知我，我想这次多半是老范得了急病。以后的一些天，打电话问谌容老师，她说老范住在协和医院，高烧一直不退，很危险，医院发了病危通知书，不过她说老范多次从病危中活过来，医生都说是奇迹，不知这次还会有奇迹。

然而奇迹没有发生，4月25日得知老范去世的噩耗。“再见”到老范，他已平静地躺在协和医院的告别室里。

老范和我们共同进行的工作没有完成，剩下的还是更重要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和改革开放的十余年。

我认为老范的大脑是中国新闻史乃至整个中国当代史的一个宝藏，没能把他经历的和知道的都说出来、写下来，对他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对许多和我一样想了解中国过去并关注中国未来的人也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对于老范和我们，这个遗憾是永远的。

到八宝山送别老范后，回到家里，我把老范最后一次谈话的录音带拿出来，默默地听了一遍，努力让自己相信老范真的不会再说下去了。

2001年5月

目 录

写在前面	(1)
我认识的老范和未完成的书稿	(1)
第一部分 探索(1952 年—1957 年)	(1)
一 建设武汉长江大桥	(5)
二 修筑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	(28)
三 从“不要蛮干”到反冒进	(64)
四 从那时开始的春运	(99)
第二部分 遵命(1957 年—1966 年)	(133)
一 “乘风破浪”的年代	(138)
二 大炼钢铁放“卫星”	(172)
三 批判彭德怀 继续“大跃进”	(216)
四 攀登珠穆朗玛峰	(263)
五 “鞍钢宪法”和“工业七十条”	(296)
六 学工、学农、学军	(311)
第三部分 灾难(1966 年—)	(327)
后 记	(334)

第一部分 探索

(1952年—1957年)

范荣康口述

我1952年底从重庆《新华日报》^①调到《人民日报》工作，报社领导安排我在工业组做编辑和记者。《人民日报》编辑部那时跟现在一样是采编合一的。五十年代初期，《人民日报》的社址在王府井大街南口西侧的大甜水井胡同，全报社一共有二三百人，邓拓是总编辑，负责报社的全面工作。报社编辑部分为政治、工业、农业、财经、文教、文艺等组。我所在的工业组共有六七个人，组长是林聿时，副组长是聂眉初和汪奇，林聿时和聂眉初是从《东北日报》调来的，他们和我一样，是从各地报社调来充实党中央机关报编辑记者队伍的。那时我刚满二十三岁，是工业组最年轻的记者，

^① 范荣康工作的《新华日报》是1949年12月10日在重庆创刊的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1954年8月西南局撤销时停刊。这份报纸延用了毛泽东为老《新华日报》题写的报头。

分管采访、编辑交通和邮电方面的报道，经常跑的是铁道部、交通部和邮电部。

那会儿报社的人手少，也没有后来专门负责写社论和评论员文章的评论部，分管各行业的记者不仅要写日常的消息、通讯，还要写自己所管行业的社论。一般的情况是，记者主管行业每有重大事情，要向组长报社论的选题，开会议一议，便由记者独立撰写，稿子写好后，先送政务院主管部委的领导审，最后由总编辑邓拓定稿签发。

五十年代，《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很多，几乎天天有，有时还一天两篇。从初到《人民日报》工作至1957年这段时间，我为《人民日报》写了很多篇谈工业交通工作的社论，我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讲课时，对这一时期写的社论选题曾讲过一段话，我觉得能概括这一时期的工作：“我自己写的社论，大体有两类题目。一类如：《不要蛮干》、《不要随风倒》、《勤俭办企业》等等。这些社论，从题目上就可以看出，主题非常鲜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一目了然。另一类如：《加紧努力完成今年的基本建设计划》、《大规模地开展地质勘探工作》、《提高重工业产品的质量》、《保障工人在生产和建设中的安全》等等。这些社论，不能说它没有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但严格地说来，这些社论的论题，它只是圈定了一个业务工作的范围。通常只做过这样的考虑：‘质量问题很突出，要写篇社论喊一喊’，甚至只是：‘质量问题很久没有发言了，要写篇社论提一提’就把题目定下来了。”^①

在这一时期，为了写好《人民日报》社论，我做了一些探索，从选题、立论到写作方法我觉得都有独到之处，为《人民日报》社论带来一股新风。

一晃快五十年了，我记不得自己为《人民日报》写的第一篇社论是什么时候、什么题目了，就从还记得的文章说起吧。

^① 刊载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辑的教学研究报纸《新闻与出版》，1957年4月10日第一版。

一 建设武汉长江大桥

范荣康口述

1954年2月初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过了关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决定，因为我是分管报道交通工作的记者，按领导布置执笔撰写了《努力修好武汉长江大桥》这篇社论，于这年2月6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头一两年还要平定国民党残余力量和各地的反对势力，局势一旦稳定，自然要开始经济建设，在苏联政府相关部门和派到中国常驻的苏联专家协助下，中央人民政府制订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53年1月1日开始实施，计划用五年时间完成。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计划中的很多大的工程项目陆续开工，《人民日报》一般要发表社论祝贺。1954年2月以前武汉长江大桥已经开工，主要是先修建引桥、汉水铁桥等，并为修建长江正桥做准备，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决定算是大桥正式开工，这篇社论就是祝贺开工的社论。写这篇社论时我还一次没去过武汉长江大桥建设工地，但这之后我在修建过程中去了很多次。

社论大致分五个部分，先写到长江和武汉的概况；然后叙述过去几十年间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使人民和工程界人士修桥的愿望付之东流



刊登《努力修好武汉长江大桥》社论的
《人民日报》版面。

的历史；第三部分论述修建武汉长江大桥对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第四部分说“武汉长江大桥的兴建，开辟了我国桥梁建设事业的新历史”；最后谈到大桥工程的艰巨性。

想想从那时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现在看这篇文章还是挺好的。只是结尾处有几句当时的流行用语，现在看是过头话。比如最后一段文字中的“毛泽东时代是一个把千万人的理想变成现实的时代，是一个千万人民创造奇迹的时代”。

三年多以后，1957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时，《人民日报》按常规发表社论庆贺，我又写了题为《伟大的理想实现了》的社论。